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Pan Wenguo

潘文国
学术研究文集

潘文国 著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

总策划：庄智象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of
Renowned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of China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Selected Academic Papers of
Pan Wenguo

潘文国 学术研究文集

潘文国 著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

总策划：庄智象

Selected Academic Works of
Renowned Foreign Language Scholars of China

图片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文国学术研究文集/潘文国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论丛)

ISBN 978-7-5446-4941-4

I. ①潘… II. ①潘…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270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蒋浚浚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47.25 字数 745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941-4 / H · 2179

定 价: 12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会名单

总 策 划：庄智象

编委会成员(按字母排序)：

戴炜栋 桂诗春 何兆熊 何自然 胡文仲

胡壮麟 黄国文 黄源深 卢思源 潘文国

石 坚 束定芳 汪榕培 王 蔷 王守仁

文秋芳 徐真华 许 钧 杨惠中 杨仁敬

张绍杰 庄智象

总 序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即将跨入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的实践、四十年的发展、四十年的成就，令世界瞩目。这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进步，成绩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开拓和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步入了快车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伴随着时代步伐，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外语教育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国家发展需要，全面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功不可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推动外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繁荣、社会服务、文化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外教社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语出版基地之一，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外教社策划出版的“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在全国外语界和出版界

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被有关媒体列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外教社组织策划了“中国知名外语学者学术研究丛书”，计划出版100种，诚邀国内外语界知名专家学者，请他们梳理和精选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自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和成果，结集出版，记录他们在各个外语学科领域或方面的所思、所学、所想和所为。丛书内容丰富，所涉领域广泛，几乎涵盖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外语教育、教学研究、翻译学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等各个重要领域，包括：语音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语用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作家研究、文学作品研究、英汉对比研究、翻译理论和与实践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家与翻译作品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研究、教材与教学研究、测试理论与实践研究、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学科融合与人才培养研究等，既有理论研究和提炼，又有丰富的实践体验，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语学科方方面面的实践与发展、成就与成果，是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一代学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外语教育四十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外语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演变的轨迹和不断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体察一代学人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精神，尤其是他们在探索和创新中体现出的既积极跟踪国际学术研究发展，及时介绍、引进各种先进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又紧密结合中国外语教育的需求和实际，积极有效借鉴他人成果，针对我国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现实，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创造、创新解决现存问题，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有力有效地促进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的示范和引领价值。

丛书的作者大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语教育领域、各个学科或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其中不少前辈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她的变化与前行，经历和体验了发展过程，主持或参与了不少外语教育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实施，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勤耕不辍、孜孜不倦，在各自研究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敬佩、敬仰和骄傲的成绩。他们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奠基

人，或是代表人物、主要建设者，推动、影响和引领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大都年事已高，从改革开放启始时的青年才俊，风华正茂的外语学术栋梁，步入了古稀、耄耋之年。整理、遴选和出版他们的优秀学术成果，正是为了弘扬我国知名外语学者敢为天下先，善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继承他们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那种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

丛书的作者们与外教社有着十分融洽的长期合作，既是外教社的杰出合作者和最珍贵的资源，又是外教社员工的良师益友。他们有的从建社一开始就是外教社不签约的“签约作者”，始终如一地关心、支持外教社的发展；有的尽管合作时间稍短，但一直对外教社的各项工作鼎力相助。他们不但将其得意之作首选外教社出版，而且始终关注国内外外语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繁荣，及时向外教社的编辑们提供信息，介绍成果，提想法，提建议，献计献策，有力地推动了外教社出版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支持了外教社办社水平的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学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崇高的敬业精神，强烈的事业心，敢于担当的责任心，勇于开拓的进取心，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不图虚名，谦虚谨慎，全心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的献身精神，始终激励和鼓舞着外教社人砥砺前行。他们中不少是教材编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会、考试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等各类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或重要成员。长期以来，他们活跃在外国语言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研究、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评审、教师培养与发展、教学研究与评估等各个研究领域，不遗余力，不断进取，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外语出版事业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重大的贡献，外教社的同仁们一直心存敬畏和感激。

回顾昨天，了解历史，思考今天，直面机遇与挑战，让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前辈学人学高、身正的大师风范，展望明天，拥抱未来，奋发图强，更好地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为开创外语教育事业新局面，继续前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庄智象

2017年5月

我的“古今中外”之路

——代前言

在学界，我大概以研究领域涉及“古今中外”而为人所知。一些朋友和同事还时有溢美之词，如“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类。从表面上看，我的研究似乎确有这样的特色，我于古今中外俱有涉猎，而且均有专著问世：于“古”，我有《韵图考》和与汪寿明先生合著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于“今”，我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发行，并有《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为学界注目；于“外”，我有《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的中英文版在国内外出版；于“中”，或者说当下中国，则有《危机下的中文》一部忧世之作。至于交织古今中外的，则有已重印十余次的《汉英语对比纲要》和《中外命名艺术》等书，还有关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几十篇论文和四五部译著。而且我横跨几个学科担任博士生导师，培养的学生搞古、今、中、外的都有，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也当得起这四个字。但实际上，每当我听到这四个字的赞语时，心中有的只是惴惴不安。所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真正学贯中外的大师早已远去，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可能见到王国维、陈寅恪、林语堂、钱锺书那样的巨人，甚至连我们的师辈——王力、吕叔湘、许国璋等，也已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峰。今天我们谈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毋宁说只是在谈论一个目标，一种努力方向，希望年轻人从我们身上跨过去，接上老一辈的优

良传统。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只是过渡的一代，我们既缺乏前辈那样的扎实功底和深厚学养，又缺乏年轻人那样的闯劲和开阔视野，而且年纪已近古稀，再要有大作为已经很难。能够认真做好传交工作，把我们从前人那里学来和自身积累的点点滴滴交给后人，让他们在新的起点上向高峰攀登，这大约是我们能对历史做出的最大交代。作为这一代中正巧旁涉古今中外各个方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个体，我想我的经历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会引起一点兴趣，不过对他们的治学道路是否有用，我就不敢说了。

说来有意思，人在年轻时都怀有各种梦想，但真能在日后实现的，却寥寥无几。而我竟可说是这寥寥无几中的一个！在中学时我们都写过诸如“我的理想”这样的作文，而我在高三时写的作文，其理想竟是用英文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世界去！须知那是在1962年，最讲政治的年代，而中国几乎处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不要说与国外的交流，甚至学外文的人数也非常可怜，更不要说有什么“对外汉语”“对外文化传播”之说了，而我竟鬼使神差地写了这么一个“理想”，仿佛冥冥之中已经预知我几十年后的职业生涯了！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在当时，只是我无法割舍我对英语和古典文学的两大爱好，梦想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而已。因此我的“古今中外”，其实在那时已埋下了种子。

在“古”与“外”两个爱好上，我是从“古”开始的。余生也晚，没有上过私塾，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对古典文学的爱好是从小学时的乱读开始的。与那个年代许多人一样，我读的是《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说唐》《三侠五义》那样不入现代人法眼的通俗小说，当然也有现代人看来也有点意义的《说岳全传》《封神榜》《列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红楼梦》。所谓几大名著我在小学时就已读得差不多了。而且我读书还有一点与人不同，一般小孩子看这种小说，碰到《红楼梦》里的那些诗词，《三国演义》里那些“后人诗叹曰”，或者《西游记》里那些骈文般的场景描写都是跳过不看的，而我却能读得津津有味。这一“乱读”造成了几个后果，一是多少有点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二是养成了爱读课外书的习惯（我到现在还认为，所谓“知识”，都是从课外书看来的，课堂上其实学不到多少东西），三是培植了对诗词的爱好，不久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就从小说转到了诗词。对外国文学的接触是从初中开始的，那时读的也不过是《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

言》及东欧国家的一些民间故事。也有一些苏联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及一些卫国战争、反间谍小说。真正的世界名著要到高中才读到。我写的第一首诗是模仿当时流行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诗，那是在1957年，内容是歌颂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其后到了1958年我也学写过好几首“新民歌”，也就是豆腐干式的新体诗。学写新诗，使我感到了新诗的浅薄，从而更义无反顾地转到了旧体诗词上。

高中阶段是我走上“古今中外”道路的真正起步。在初中时，我虽对文学很有兴趣，但主要兴趣还是在理科上，特别痴迷于平面几何和无机化学两门课，初三时我还担任了班里的几何课代表。进入高中后，一开始我仍维持这一兴趣，作为班里的学习委员，我组织三角和代数课代表，把整本三角教材的内容和公式贯通为一个大表，以方便全班同学的使用，很受欢迎。但很快，我的兴趣转向了语文和外语。回想起来，这一转向有两个诱因。当然，对数学的爱好后来也没有白费，人说学数学就是学逻辑，那时的数学训练对我今后思考和写作的逻辑思维能力应该是不无益处的吧。

两个诱因之一是我碰到了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三年三位语文老师 and 三年一贯的英文老师。高一语文老师是邹兆玲先生。记得第一次上作文讲评课，我正坐在下面心不在焉，突然听到我的名字被读了出来，这才意识到邹老师在朗读我的作文。虽然我的作文在初中时也还过得去，但进入新学校的第一堂课就被读了出来，那还是觉得意外并得意的。之后几乎隔三差五我的作文就会被当堂读出来，时时引来同学们艳羡的目光。现在看来，所谓“表扬法”对一个学生在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文章老被念出来，在我自己和同学的心目中就以语文的高手自居了，要是有多几次作文没被读出来就反而觉得不自在了。但我也有些质疑这种“表扬教学法”，这对被表扬的学生自然有极大的心理暗示作用，但对更多未受到表扬的学生呢？恐怕就不好说了。高二的语文老师是陈砚田先生，陈先生精于古典文学，尤好诗词，我与他诗词唱和，学到了很多东西。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两首五言律诗请他指教，他回我一首七律，其中有句云：“七步成诗三步曲，原来文苑不寻常”，很使我得意了一番。他对我尤其青睐有加，在他任教的一年中，我的作文篇篇都是5分，连“5-”都很少。高三的语文老师是语文教研组长余邦彦先生，余先生是全校乃至全区的语文泰斗，他开

始时大约是要有意压压我的锐气，接连几次作文都只给我4分，让我觉得很没面子，但不久，我的一篇当堂作文《游仙记》终于使他刮目相看了，那篇作文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一篇“穿越小说”，写五六位古代诗人结伴到今天游玩，所见所闻，并把他们的诗句穿插其中。洋洋三千字，两节课完卷。他在评语中说：“想象丰富。非平日多读，曷克臻此！”从此我的作文又是一路5分高歌上去。这样接连三位老师的青睐，使我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增。

与今天的学生不同，我是从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启蒙老师是金峰先生。金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那时正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加上一手好钢琴，迷住了很多人。听他上课，特别是英文朗读，简直是一种享受。从现在的眼光看，一个好的启蒙老师，对外语学习实在至关重要。金先生任教的两个班，学生喜欢英语的不少。而另两个班就吃亏了，因为老师不管是英文中文，都是一口浓重的乡音，把学生的兴趣都打退了。金峰先生还有一个今天颇有争议的教学方法，即喜欢考试加排序。每隔一两周就要考一次，而每次考完必定对全班50个人全部重新排序。一排序，每个人的名次当然会上上下下，但幸运的是，我从第一次排序名列第一，一直到高三分文理科前，这个位置从没移动过。结果连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当着我的面对别的同学说，在语文和英语上，我是“绝对权威”。而我自己也觉得，我大约是天生与这两门课有缘的。

另一个诱因是因为我担任了班级的学习委员，职责之一是负责全班的图书借阅工作，这就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条件。那时一般同学都必须翻目录卡，填借书单，而不允许进入图书馆；而我却可以进出，时间久了，图书馆老师更允许我可以随意翻阅。这样，无意中我有了两个收获。一是我得到了在当时条件下一般学生没有的可以自由遨游书海的权利，大大地拓宽了我的阅读面和阅读量，二是由于所有其他同学借书都要经过我的手，我藉此了解了所有同学的阅读爱好，而且先于他们读到他们所要借的书，等于他们的知识积累也同样贮备到了我的脑子里。我因此而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历史传记、科普常识乃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书籍。这对促成我后来知识面相对较广、考虑问题时思路较为开阔很有帮助。当然，那时我自己的主要阅读兴趣是在古典诗词，几乎读遍了唐宋以来名家的选集，旁及许多关于诗词格律方面的著作。由于当时一

般学生都买不起书，因此读诗的方法是抄录，几年中我发疯似的抄录了几大本诗词，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高考时尽管我的理科成绩在班里也名列前茅，但由于兴趣关系很快将它排除了。我真正面临的两难选择是报中文还是报外文。如果当时有对外汉语或者翻译专业的话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但当时没有，我只能二中选一。反复权衡的结果我还是把中文放在前面，英文紧随，这样，志愿一、三、五、七……是中文，二、四、六、八……是外文，然后就听天由命了。结果也真是天意，我没有录取到第一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却录取了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外文系，而当年外文系的录取分数实际上比中文系还要高！据后来有老师告诉我说是因为我的口试成绩特别好，因而被外文系横刀夺爱，也不知是真是假。

在大学里遇到的好老师就更多了。复旦大学外文系那时正名师云集，只是很多老师我们无缘上他们的课。给我们上过课的有任治稷、巫漪云、程雨民、杨岂深、陆国强等，但对我影响最深、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教三年级精读的刘德中先生和三四年级翻译的朱复先生。刘德中先生上课用的方法也许可以叫做“中心词开花法”，他讲课不重课文内容而重字词的意义用法，每次听课总觉收获特别大，记下的课堂笔记就像一部小型的英语用法词典，同学间都当宝贝似地相互传抄，我到今天还保留着当时听刘先生课的全部笔记，每次翻阅，总觉受用不尽。对于他用的这个方法后来的英语教学界是有争议的，也许不赞成的人是多数。但不管理论上怎么说，从学生的角度我觉得是真正受益的。而且越到后来，我越认为这是学习英语最合适的方法。我们读书期间曾流行英国 Eckersley 编的一套 *Essential English*，其编写方法就是前两册重语法，后两册重词汇（该书三、四册辟有 Word Study 专栏，非常实用），我认为就非常适合英语的特点。因为英语的语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再笨的人一两年也学会了，之后就是词汇和习惯用法问题，那是要花终生气力的。而课文本来只是起个引导作用，就好像敲门砖，是为敲开语言这个门服务的，把学习重点放在回答有关课文内容的问题上，就像后来很多教材做的那样，我以为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四年级时我们小班作了调整，接上精读课的是陆国强先生，陆先生上课就完全采用了刘先生的方法。复旦从葛传槩先生起，经过刘先生，到陆国强、陆谷孙诸先生，一直有个重词汇、重用法的传统，而以刘先生在教学上的体现最为出

色，对夯实学生英文功底、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贡献最大。“文化大革命”中刘先生夫妇含冤自杀，我认为这是复旦外文系最大之殇。另一位我难以忘记的老师是教翻译的朱复先生，在那时，翻译是一门副课，不怎么受重视，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翻译教材，上课多以实践为主。朱复先生年纪虽大，但名气好像不怎么响。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他的认真批改精神，一篇作业交上去，发下来时肯定是满纸红色（密密麻麻的批改之处），人人如此，篇篇如此。有时我们按他的建议修改后交上去，发下来时多半还会是一片红色，因为他又想出了更好的译法。这样批改，他花的精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学生却实实在在地受益。多年以后我自己当了教师，批改作业时也学会了这种态度，从不敢随随便便写个“阅”字就把学生打发了。我不论教中文作文还是英文翻译都曾多次把作业改得一片红色，就是学朱先生的结果。

进入外文系后，还有一点改变了我的习惯，那是在读了英文原版小说之后。那时国内出版的外文书非常少，尤其是文学书。跑福州路外文旧书店，能看到的也就是一些医学及理工科的图书，真正读到原文外国小说是在进入外文系之后。接触之后，觉得非常新鲜，与原来我读的中文小说以及翻译小说（尽管高中时读的也都是一些名家名译，如朱生豪、张谷若、董秋斯、杨必、王科一、傅雷等，译笔自是一流，但感觉与中文创作还是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特别是看到英文的一些词语可以用得如此巧妙、如此精彩，令人拍案叫绝，觉得再好的翻译也不能代替。自此我逐渐养成爱读原文的习惯，开始是小说，后来几乎所有文字材料，只要能找到英文原文，我决不愿意看译文。甚至连原文是法、德、俄文的，我也宁可看译成英文的而不爱看中文译本。我到现在也说不出这一习惯是好是坏，但我外国文学的阅读量的因而比别人要少可能是真的，因为大学二年级以后，我就基本不看翻译作品了。

在复旦还有一件事要着重说说。进了外文系后，我本来以为将与我的中文爱好告别，不料复旦外文系特别重视中文。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我们接连用中文开设了文学概论、写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四门课，而且好几门还是与中文系的同级同学一起上的，上课的教师是吴欢章、翁世荣、顾易生、潘旭澜等一时之选，后来都成了中文系名教授。因而我的中文不但没有抛弃，反而受到了更系统的教育。回想起来，这一举措对于我最终走上“古今中外”

的道路有关键的意义。“文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国内有哪家外语院系，有如当年的复旦外文系那样重视中文基础的培养，如果那些年复旦的做法能得到坚持和发扬，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喋喋不休地呼吁“消除两张皮”而又鲜见成效吗？当前的外语院系一方面都讲要加强中文修养，另一方面要增加一点中文课时又如此之难，其症结究竟何在？

“文化大革命”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一所公社中学当老师，英文自然是教不成了。几经调整，让我教语文。教材是一本小红书，当时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的汇编。那些文章可说千篇一律，许多人会觉得没法上。对我这个没读过师范、不知教学法是何物的新晋教师更是个难题。但我用了从刘先生那里学来的“中心词开花法”，硬是从单调的文章中找出可以发挥的语词，联系成语典故、历史文化、字词演变，居然可以讲得眉飞色舞，一篇短文讲三四堂课还意犹未尽，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学到许多东西。回过头来想想，语文课就是要学语言，而语言是从字词开始的，这是最扎实的东西，能学到字词及其用法，又何必在乎用什么教材呢？几年后我调到南昌教英语专业精读，又如法炮制，学生也大感受益。尽管当时的教材都强调政治挂帅，课文枯燥乏味，但这一方法照样让学生学到了实实在在的英文知识。

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在报考时我面临又一个选择。我本科英语，又是英语教师，报考英语当然是最自然的选择，然而我却报了几乎不为人知的汉语音韵学。其实这是我的扬长避锋之举。报考英语，我有一大批同学想回上海、回复旦，这样同门厮拼在所难免，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音韵学虽非我专长，却是连中文系多数学生都不懂的“冷门”，凭我由研读诗词而积累起来的知识，未必输于别人，加上我有外语的绝对把握，偏锋取胜的可能性极大。考试结果不出所料，我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华东师大，开始了我正式的语言研究生涯。

搞语言研究，我可说是从零开始。我原来的中英文基础都与语言无关。中文我爱好的是古典文学，英文呢？我记忆中，在复旦五年，没有上过专门的英语语言理论课，倒是上了大量中国文学课。我所有的语言和翻译知识就是大学期间省吃俭用买的一本张道真先生编的《实用英语语法》及张培基先生的《习

语汉译英研究》《英语声色词与翻译》两本书。由于毫无基础，因此一切得从头开始，我的办法是穷尽性阅读。音韵学是从读遍《中国语文》杂志上所有的音韵学文章和能找到的20世纪所有的音韵学著作开始的，进而啃清人的原著。语言学我从戚雨村先生的《语言学引论》入门，然后精读了三本书：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和萨丕尔的《语言论》，其中第一本更是以法文为主，参照英文译成中文的方法来读的。后来当然又读了不少语言学的书，但一直到现在，这三本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也是我经常推荐给学生读的书。此外由于导师史存直先生对语法特别有兴趣，我也通读了20世纪诸语法大家的著作。说来惭愧，我是那时才第一次听到张志公、朱德熙等先生的名字，比起现在的年轻语言学者差多了。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韵图考》，这个选题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因为经过学习，我发现汉语音韵学的三大部门，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中，等韵学是基础，也是这一学科的理论核心。等韵通了，全盘皆通；等韵不通，就只能总在外围打转。前人云：“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我看前面还要加上一句，“等韵明而音韵明”。等韵是音韵学中最难懂的部分，我之选择这一题目，就是想从最难的地方啃起，从根本上弄通这一学科。这一篇硕士论文，我写了17万字，得到了答辩委员会主席吴文祺先生的高度评价，一家出版社也马上向我约稿。然而由于我对“处女作”的特别谨慎，反复修改，此书直至1997年才正式出版。

从1982年至1988年我教了七年古汉语，我惊讶地发现，我从刘德中先生那里学来的“中心词开花”的教学方法，用在古代汉语的教学上十分得心应手。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由音韵而至文字，由文字而循字、句、章、篇的途径弄通全文，这一训诂学的途径，本就是古文学习的基本途径。如果刘先生的方法也来自传统西方语文的教学经验的话，则可说明，在语文的学习上，中西本就有相通之处。只是这相通之处不在语法，而在基本的字词。这是我后来产生“字本位”想法的最初起源。为了教好古汉语，我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弄通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同时阅读了大量古籍。“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现在的一些“国学”基础其实是在教学过程中逼出来的，与老一辈们自幼浸润其中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从小学入手的途径却与时下很多谈国学者不同，从

字词入手更容易有新的发现和创见。

1985年后我受命为新组建的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英汉对比语法”课，从以往对两种语文的教学经验出发，我敏锐地感到英汉语法对比要从字词组织也就是构词法开始，这是两种语言组织上通下达的枢纽。因此我的第一篇英汉对比论文是关于构词法的对比，写于1987年，但载有这篇论文的集子到1991年才出版。1988年我被派到英国留学，合作导师 David Taylor 博士和叶步青博士在了解了我的兴趣之后，建议我系统研究一下构词法的问题，Taylor 博士特别从他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要研究一个问题，必须透彻全面地掌握资料。于是我放弃了写一两篇论文的简单想法，再一次从头来过，系统阅读、整理了从《马氏文通》以来，所能找得到的有关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海内外用中英文撰写的全部文献，共700多部（篇），以时代为序，做了几千页的笔记和摘录，花了几乎两年时间。然后开始撰写专著，一开始因为考虑想在英国出版，用的是英文。写了几章，觉得进度太慢，又改用中文。但即使如此，到一年后我准备回国时，还是只完成了计划中该书的上部，即历史叙述部分，但已经有了40多万字。我们决定将这部分以《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的名称单独先行出版。那时我的字本位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但还没有成熟，不想贸然在以客观叙述为主的书中提出来。但我仍然提出了“五合一”的汉语构词法研究新格局，即汉语构词法（WF）由WA（析词法）、WB（借词法）、WC（造词法）、WD（分词法）和WE（用词法）五部分组成。1993年此书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奠定了我在海外中国语言学界的地位。

在国外的另一个收获是得以就近阅读了大量西方语言学英文原著，就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洪堡特出版于1836年，而英文版直到1988年才问世的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一书，就我留英期间（1988—1991）而言，此书是我读到的最新的西方理论语言学著作，它对我的影响完全可用“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二词来形容，自此我的语言观和语言研究思路基本形成。当我回国后重新准备“汉英对比语法”这门课程时，我的想法与几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我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研究思路，其结果就是目前在英汉对比界可说影响最大的《汉英语对比纲要》一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谭慧敏博士也是因为看到了此书，遂邀请我于2004年赴新与她进行合作研究。2006年、2007年我们合作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一书中英文版先后在中国与英国出版，我把这一思路借用司马迁的话作为书的题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已成了我治学的座右铭。

我始终没有忘怀我的古典诗词情结，回国前我协助叶步青博士在英国创办了一个中英双语杂志 *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并自告奋勇开了一个“唐诗欣赏”专栏，由此开始了我的翻译生涯。我翻译的唐诗后来结集于1995年在英国出版，这也是我在国外出版的第一部书。

1994年我受命担任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首任系主任，其后几年有相当的精力放到了行政事务上。1999年我被委派到澳大利亚担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的汉语顾问。在此期间，目睹海内外汉语研究与教学的现状及国人对此的麻木，我按捺不住写了一篇《汉语研究：世纪末的思考》长文，对20世纪的汉语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由于时任《语言研究》主编的汪平教授力荐，这篇近4万字的文章竟然一次性地在该杂志刊登，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以前的语言学界朋友甚至要劝我“迷途知返”。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我在《汉语的构词法研究》和《汉英语对比纲要》二书中将说未说或欲说又止的思想整理写出了一本新书《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从正面提出了我的汉语研究的主张。之后我又与徐通锵先生合作，共同主编了《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并主动承担了其中的《字本位与普通语言学》一书的撰写。只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此书至今还未完成。

2000年初，远在国内的杨自俭先生给我来信，说2001年将在青岛召开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希望我利用在国外的机会，写一篇介绍国外翻译研究的文章。翻译是我一向喜欢的，出国前两年我还精心翻译了两本书，一本英译中的《赫兹列散文精选》和一本中译英的《二千年前的哲言》，但翻译理论我以前却真的没有特别关注过。为了完成杨先生所托，我又一次从头开始，花了四个月时间，在墨尔本各大学图书馆找到所有能找到的翻译理论著作，按照我以前研究音韵学和构词法的经验，以时代为序，进行逐一细读，最终写成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一文。在青岛会议上，蒙《中国翻译》杨平主编的青睐，得以分三期在《中国翻译》上连载，据说是开了该杂志的先河，在翻译界